

GUANGDONG XIAN XING YIBU JIANWEN LU

廣東先行一步  
見聞錄

雷仲予

雷仲予  
著



D676.5

L23

# 广东先行一步见闻录

雷仲予 著



A0770915

广东人民出版社

## 第一章 春雷掠天南粤醒

南粤大地，在经历了肃杀的“文化大革命”寒冬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声春雷，万物苏醒，生机勃勃，迎来了一个新时代。

### 一、岭南春色

1984年3月，笔者从新华社黑龙江分社奉调到新华社

广东分社工作。从白雪皑皑的哈尔滨回到广州，这里已是春意盎然，花开满城了。

此时的广东，虽然改革开放的政策才实行短短几年，但已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放眼珠江三角洲，无论城与乡，具有现代气派的楼宇拔地而起，散落在平原山谷的古老小镇，旧貌换新颜；在昔日的桑基田园上，由一座座别墅式楼房组成的新农村，开始争相崛起。在粤北、粤东山区，虽然那里的底子薄，困难较多，但也正在起步，开始告别贫困，逐步迈向富裕。

市场是经济发展状况的一面镜子。顾客走进当时广州的商店，琳琅满目，商品充盈，一派兴旺的景象。在肉菜市场上，各种时鲜蔬菜，生猛的水产品，比比皆是，任人选择。这种市况，在冬季的北方市场是难得一见的。哈尔滨的冬天既长又冷，到处都是冰天雪地，市场上供应的蔬菜，只有马铃薯、萝卜、大白菜。这“老三样”都是上年秋收后窖储起来的。市场上偶尔出现的韭菜、芹菜，因为是温室生产的，成本很高，价钱昂贵，一般市民不敢问津。有时货架上也有圆椒、菜花之类的蔬菜，据说也是从广东湛江等地运来的。

1984年，广州市已对蔬菜放开经营，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蔬菜上市量显著增加。虽然菜价上升了，但市民还是可以接受的。当时广州的猪肉市场尚未完全放开，除了牌价限量供应的，也有议价敞开供应的。对多数家庭来说，吃肉也是不成问题。

这只是笔者回到广东以后一些直觉的印象。后来笔者参加了省委、省政府召开的一些全省性的重要会议，到各地去采访调研，耳闻目睹，对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在新形势下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就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在中共广东省委历届领导班子的引领下，广东的改革开放之船，朝着既定的目标，迎着风浪前进。

1978年3月，中央调习仲勋来广东工作，任省委第二书记。同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决定，习仲勋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杨尚昆任第二书记。这两位资深的领导人，按照中央的部署，认真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在筹办经济特区，恢复和发展经济等方面，带领全省人民进行开创性的工作，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80年11月，习仲勋、杨尚昆奉调回中央工作，任仲夷从东北调来，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在临来广东工作之前，邓小平对任仲夷殷殷嘱咐：广东的工作要从抓政策人手，调动积极性。要充分发挥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办特区的有利条件，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

1983年2月下旬，中共广东省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选举产生了中共广东省第五届委员会。随后在3月初召开的省委五届一次全会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的常务委员会。任仲夷为第一书记，林若、梁灵光、谢非、吴南

生、王宁为书记。

任仲夷曾长期在黑龙江、辽宁工作。由于工作关系，笔者在黑龙江工作的时候，与任仲夷曾有过多次接触。任仲夷在领导工作中敢于负责，讲究实事求是，富于创新精神，讲话深入浅出，语言幽默，富于哲理，在黑龙江的干部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笔者调到广东工作以后，曾经拜访过任仲夷，转达黑龙江一些干部对他的问候和致意。在列席省委常委的一些会议上，也直接听到过他对一些问题的精辟见解和做出的坚定指示，很有一番不管风吹浪打，坚决把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的决心。

1985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调整广东省委的领导班子，由林若任省委书记，主持省委的全面工作。省委不再设第一书记。

1986年12月，广东省委召开有地市和省直机关党政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回顾、总结“六五”经济工作，对“七五”经济工作进行部署，力争全省经济工作在发展水平和效益方面更上一层楼。

“六五”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广东省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指引下，坚持改革开放方针，运用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努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就。

国民经济持续地以较高的速度发展。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3.6%，国民收入增长11.7%，扭转了长期

以来广东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状况，跃居全国第三位，增长之快是广东过去没有过的。

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趋于协调，农业改变了“以粮为纲”的布局，农林牧渔和乡镇企业全面发展，农业商品率大幅度提高；工业初步形成了有利于发挥广东优势又适合市场要求的企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广货”面貌焕然一新；第三产业以高于其他产业的速度蓬勃发展。全省开始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开放型的经济结构。

经济实力明显增强。通过多渠道筹集资金，新建和改造了一批生产项目，改善了电力、港口、交通、电信、旅游等设施；通过积极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和设备，装备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特别是工业交通部门。所有这些，显著增强了广东的物质技术基础，为今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积蓄了后续力量。

继农村改革以后，城市的改革也在许多方面展开，经济逐步搞活。

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财政增收与产值增长同步，人民生活改善与生产发展同步。富裕地区向“小康”目标迈进。

省委书记林若在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指出，广东“六五”建设的特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放得开，搞得活，上得快”。这是坚持改革开放的结果，是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结果。“上得快”，是因为“放得开、搞得活”；“放得开”、“搞得活”，是因为中

央给了广东特殊政策、灵活措施。

岭南春色就是这样来临了。

## 二、广东的昨天

冬去春来。今天是从昨天过来的。那么，广东的昨天又是一幅什么图景呢？

广东全境解放，晚于共和国诞生。为了在一个废墟上建设一个新广东，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并肩战斗，奋力拼搏，建立了不朽的基业。然而，广东还是落后了。

从1953年至1978年，广东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只有5.1%，比全国低1个百分点；从1966年到1978年的10多年间，广东的国民经济不但落后于先进的省份，发展速度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此期间，全国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6.6%，广东只有5%；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8.5%，广东只增长7.2%；财政收入，广东平均每年增长5.5%，也低于全国增长6.9%的水平。1979年，全省人均工农业生产总值只有513元，而全国是636元。

广东濒临南海，毗邻港澳，华侨众多，自然资源也颇为丰富，具有发展经济的优越地理条件和人文条件。但



是，广东的经济发展为什么长期落后于人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其波及之广，影响之深来说，主要有两点：一是长期推行的闭关锁国政策，立足战备，经济建设没有摆到应有的位置；二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以阶级斗争为纲，对经济建设造成严重破坏。在这种政治气氛包围之下，广东的优势不但没有得到发挥，反而变成了劣势，有利条件变成了不利条件。

新中国建立后，逃到台湾的蒋介石反动集团的残余势力，不甘心失败，在美国的支持下，不时对沿海进行骚扰，伺机反攻大陆；抗美援朝、中苏边境自卫反击战、对越自卫反击战等等，更增加了备战的气氛。处于沿海的广东成了备战第一线，随时准备打仗。国家的许多重点建设项目不往广东摆。“一五”期间，全国有 141 个重点建设项目，华南地区一个也摊不上；原苏联援建我国的 156 项重点建设工程，只有一项摆在广东，那就是开发茂名油页岩。广东自己的重点建设项目也很少。

60 年代，中央考虑备战的需要，提出建设“大三线”，这是根据全国不同的战略地位而作出的一种地域规划。一线指沿海和边疆地区，三线指长城以南、京广线以西的地区，两者之间为二线。中央要求一线的建设，必须结合战略战备的需要。广东作为一线，广州、汕头等沿海城市的一批骨干企业被迁往江西等地，削弱了当地工业的自我更新和自我发展能力。1964 年，广东又提出建设“小三线”，即在一个省的范围内，也要开展“三线”建

设，这个意见被中央接受了。于是，“大三线”、“小三线”就在全国搞起来了。广东规划粤北山区和当时尚属广东管辖的海南岛腹地为本省的“小三线”，在那里建立小型军工厂，将广州和广东其他沿海城市的一部分民用工厂，迁往“小三线”，实施“靠山、分散、进洞”的方针。有的工厂建在“小三线”的山沟里，工艺流程长达30公里，组织生产十分困难。投资不少，经济效益却很差。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对全国是一场浩劫，广东尤甚。广东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抢班夺权、南逃另立中央的据点。他们或公开点火，或阴谋于密室，在南粤大地掀起层层恶浪，搞乱了人心；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之名，多次插手广东，搞乱广东，破坏生产，广东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大批干部被打倒，靠边站，人人自危。

广东是全国的重点侨乡。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海外的华侨、华人和居住在港澳地区的同胞3000万人以上，原籍广东的就占三分之二。他们虽身居海外，但血管里流淌的是炎黄子孙的血。无论在流逝的年代还是现在，对祖国故园一往情深，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重要历史关头，广大侨胞挺身而出，支援革命，支持人民战争，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辉煌业绩。

然而，黄永胜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行极“左”路线，炮制了一个所谓《处理有港澳海外关系干部的六条意见》，明令“凡有海外港澳关系的干部，不得在要害部

门任职或担任领导职务；经过教育仍与海外港澳亲友保持政治、经济联系者，要从严处理”等等。这个被群众称之为“黑六条”的《意见》，把正常的海外关系视为里通外国，在归侨和侨眷中抓“特务”、“叛徒”，致使全省这类冤假错案达6 000余宗，涉及归侨、侨眷1万余人。不少在党政机关工作的归侨或有海外关系的干部受到怀疑，甚至被批斗，强迫他们“斩断”与海外的联系。不少归侨、侨眷的房产被没收。著名侨乡台山成了大批“向洋、崇洋、靠洋”的大会场，批判会一个接着一个召开，很多归侨、侨眷受到迫害。“一片爱国心，两行辛酸泪。”这就是当时一位归侨发自内心的悲愤。

在农村，许多地方把自留地、农贸市场、家庭副业统统当做资本主义加以禁止。全省各地批斗所谓“投机倒把分子”、“有严重资本主义倾向”的人员将近10万人，把外出做工搞副业的59万人清理回生产队。在“挖修根”、“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行动中，出现汕头砍柑桔、河源砍桐树、顺德填鱼塘等严重破坏生产力的情况。仅1971年，全省就砍去果树22.5万亩，河源25万亩油桐几乎全部被砍光，全省鱼塘面积1975年比1966年减少了一半。这种现象虽然在全国各地普遍出现，但广东尤为严重。以水果为例，“文化大革命”前广东水果年产量为50万吨，仅次于山东的60万吨而居全国第二位。但是，到了1977年，山东的水果年产量达到150万吨，而广东却下降到31万吨。

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农民生活十分困难。全省人均年分配水平长期在 60 元左右徘徊。在粤北、粤东一些贫困山区，农民的日子更加窘迫。他们吃不饱，穿不暖，一家几口共用一张被子。家里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张床，一口锅，加上几件破旧衣服，一根扁担就可以全部挑走了。

其他的各条战线，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后果严重。

人心散乱，经济下滑，城乡商品匮乏，群众吃不饱穿不暖，这就是广东的昨天。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必需品，用的吃的，许多都要凭票证，定量供应，甚至买一块肥皂、一盒火柴，也要凭票证。居民手中的票证，最多时达到五六十种。许多东西即使凭票供应，但市场也无货。一旦有了货，群众只好排队轮候，随处都可见到排队的“长龙”。城乡居民平时的餐桌上难得有鱼肉，惟有逢年过节才一饱口福。鱼米之乡无鱼吃，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那些年代，笔者在黑龙江工作，对家乡生活的窘况没有直接的感受，但间接的感受却是有的。黑龙江的商品供应，也很匮乏，但因为有个“北大仓”，粮食较为充足一点。笔者不时将节约下来的黑龙江粮票，换成全国粮票，寄给家乡台山的亲属，对他们帮补一点。那时，家乡的人很喜欢上海产的“凤凰牌”自行车，但很难弄到一张票证去购买。笔者一位在北京新华总社工作的同乡，在北京买了一部“凤凰牌”自行车，托笔者利用回乡探亲路过北京之便，将其托运回广州。几经辗转，千里迢迢，终于把车

子带回到台山，完成了友人之托。由此可见当时在广东购物的艰难。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悠悠往事，如在眼前；可是，对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代人来说，这一切，仿佛是天方夜谭。

### 三、神州春雷

1976年10月，党中央采取断然措施，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奋起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和罪恶历史，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

但是，由于长期搞了“左”的东西，影响很深，政治上、思想上的是非，远未解决。共和国的航船，在茫茫大海中行进，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航向。

1977年2月7日，中央的报刊发表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当时的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在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这“两个凡是”加以宣扬，继续沿用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提法，认为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仍然认为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等。这就为全党纠正

“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拨乱反正设置了重重障碍。

在7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议。邓小平在会上讲了话。他强调指出，要对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不能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他指出，毛主席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特别重要。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在新的实践中使理论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这篇文章的发表引发了一场席卷神州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1978年9月，由时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主持，举办了一次有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参加的真理标准问题学习讨论会。习仲勋在会上强调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有重大实践意义的问题”。学习讨论会达成共识：“搞清楚这个问题有重大意义，这是关系到执行什么样的路线，关系到革命成败和国家前途的大问题。”为此，省委要求各地联系实际，广泛开展学习和讨论。省委宣传部随即召开各地市委宣传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理论学习座谈会，对全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做了部署。此后，全省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逐步由思想理论界扩展到地、市、县的领导机关中去。

就全国来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批判和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准确地、完整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和亿万人民的心声，促进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由于全会前有了中央工作会议的充分准备，全会顺利地完成任务：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和做法，确定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和以后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解决了过去政治运动中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重新评价了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加强和充实了党中央的领导机构，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正了党和国家的航向，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犹如神州大地的一声春雷，推动万物苏醒，生机勃勃。

1979年1月，中共广东省委召开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与会者联系广东的实际，研究如何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着重讨论了以下三个问题：如何进一步

解放思想，切实为工作重点转移提供思想保证；如何妥善处理广东历次政治运动中遗留的历史问题；反思广东的农业为何长期徘徊不前，如何才能尽快搞上去。经过学习讨论，大家对三中全会精神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澄清了许多重大的是非问题，精神为之一振，有力地推动了拨乱反正工作的全面开展。

“左”的思想影响，是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严重障碍。只有清除这个障碍，思想才能解放，工作才能迈开步伐。1981年四五月间，广东省委召开了一次领导干部学习讨论会，组织省委常委、副省长和省直部分单位的负责人，学习1980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联系工作实际，总结经验教训，讨论研究清除“左”的思想影响问题。

任仲夷亲自主持这次“务虚会”，并针对当时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和干部中的思想实际，对清除“左”的影响，阐述了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他说：“由于建国以来‘左’的影响时间长，根子深……是主体方面的错误，所以，当前从领导思想上，重点应该是清除‘左’的影响。”任仲夷指出，“左”的思想影响突出特征之一是普遍性。“可以说每个地方、每条战线都有‘左’的影响。例如，农村怕‘富’，认为富则修，富就会两极分化，富就是资本主义。工业怕‘利’，认为讲利就是‘利润挂帅’，算政治账叫‘革命’，算经济账叫‘修正主义’。现在，工厂企业要实行责任制，有些人又怕起‘包’来了。财贸怕‘活’，认



为统得死死的才叫社会主义，活就乱，稍一活起来就大惊小怪。教育怕‘智’，长期批‘智育第一’，忽视知识，不尊重知识分子。文化艺术怕‘放’，多年来实行文化禁锢政策，使一些人形成一种观念，似乎百花齐放这个‘放’字很危险，‘放’就是自由化。广东、福建要搞特区，有些人又怕起‘特’，等等。”

任仲夷说，“左”的思想影响是我们前进中最大的阻力。在落实各项政策中，在进行各方面的改革中，在搞活经济的过程中，都会感到这种阻力的存在。如果不下大力气清除，那就不可能自觉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任仲夷反复强调，我们在思想上应当既反“左”，又防右。但从领导思想上讲，重点应当是清除“左”的影响。

广东省委举行的这次领导干部理论“务虚会”，实际上是前段在全党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继续和补课。它对全省各级领导干部从思想上清除“左”的影响，提高认识，排除干扰和阻力，更好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林若主持广东省委工作期间，根据形势的发展，进一步把解放思想，肃清“左”毒，作为一件大事来抓，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以推动改革的深入，开放的扩大，建设的发展。1983年2月，林若在全省县委书记会议上讲话，强调继续清除“左”的影响，发展农村商品生产。他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就是